

对话

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王杰：

兴学强国是“双一流”建设核心使命

■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

自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——北洋大学(天津大学前身)建立至今,我国高等教育已走过了120多年的历史。其间,伴随着多舛的国家命运,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几经浮沉。

在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、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王杰看来,这一发展过程中,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和使命,那就是兴学强国。

那么,兴学强国与我国高等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?与当前的“双一流”建设又是怎样的关系呢?

一种正确的精神信仰

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是如何理解现代大学的功能的?

王杰:从功能上讲,世界上的大学大概有三个功能的发展,第一个是教育功能,指的是大学的使命是教书育人;第二个是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提倡的那种模式,把学术研究置于教学之中;第三个是美国提出的服务社会的理念。这就是近代高等教育的三个模式:传统大学以教育、教学为主;现代大学是教学、科研、学术相结合;当代大学要加上服务社会的功能。

今天,我国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“双一流”。在这里,“中国特色”是一个定语。就是说,“双一流”首先应该具有中国特色。

那么,这个中国特色指的是什么?在我看来,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兴学强国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什么是兴学强国?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其与大学文化的关系?

王杰:在我看来,办大学就是办文化。在中国,文化的定义很多,比如《易经》上说:“刚柔交错,天文也;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,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意即文化就是人文化成,而教育正是教化人以成人,就是通过教育,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上有价值的人。

大学教育,尤其是高等教育,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于人的文化的教育和文明的塑造,这是大学的本质。大学的本质是教育人、改变人。

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,文化就是人的实践所产生的成果。对高等教育来说,它是人文因素,是一个人文汇集的地方,是精神高地。在这样一个精神高地,我们首先应该给人以信仰。

我们的大学是应该有正确信仰、正确价值观的

记者快评

「预录费」背后的家长思维

■陈彬

随着9月开学季的临近,众多今年的高考考生也得到了自己心仪高校录取的喜悦,但对于有些学生来说,这样的喜讯是有一定“代价”的。

据媒体报道,不久前,湖南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要求高考统招生缴纳2000元“预录费”。也就是说,规定时间内不交费的学生即使已经达到了学校录取标准,依然拿不到录取通知书,不被录取。

这一规定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很多争议,而在笔者的印象中,湖南工商职院其实并不是第一所有此种做法的高校。多年前,也曾有高校要求学生录取时缴纳部分费用。这些高校采取如此措施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固定生源。说明白点,学生预交了学费就必须来就读,否则就要承担经济损失。

必须承认,当前部分被录取的学生开学时没来报到,从而影响了高校录取数量指标的现象并不少见,只是仅仅为了多留住几个不想来的学生,便损害所有学生的利益,这真的合适吗?

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这则新闻见诸媒体的同时,一项调查数据也出现在公众眼前。第三方数据公司麦可思对部分院校2015级、2016级的本科新生研究发现,有1/8的本科生有转专业的意愿。其中,近1/4所学专业非首选的新生想转换专业。即便是所学为首选专业的新生,也有1/13的新生想要转专业。更有甚者,对2015级、2016级有退学意愿的新生研究显示,29%的本科生想要退学的主要原因为“所选专业与自己预期不符”。

一方面,高校在采取各种措施挽留(甚至是强制留住)学生;另一方面,学生甚至不能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,在现行的高校转专业的相关制度下,学生甚至要靠退学才能达到自己重新选择专业的目的。这两则新闻所构成的对比和反差足以令高校思考。

在笔者看来,此种对比产生的原因,依然在于高校没有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从一个“管理者”转变为“服务者”。换句话说,高校的“家长思维”还比较严重。在这种思维下,学生是要被学校“管理”的。学生不服从学校的安排就会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,就必须受到惩罚。于是,“方便学校管理”成了很多损害学生利益的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但是,学校存在的目的是什么?如果学生在学校的利益都无法保障,学校办之何用?在此,笔者并不愿再提及“学校功能”之类的大道理,只是希望有类似行为的高校真的反思一下,学校的“主人”究竟应该是谁。



大学,我们所培养的人应该是正确的信仰、正确价值观的人。作为学术研究,可以谈学术自由,但是作为学术自由中的内容,就应该是在正确信仰基础上的自由。如果不是这样,就会带来危机甚至灾难。

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·加塞特说,信仰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,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醉生梦死了,对这社会不会有贡献,对自己的人生也不会负责任。

所以,大学首先是信仰,兴学强国就是一种信仰,它是近代大学的奋斗历史,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信仰追求,这一点和西方大学是不一样的,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实实在在走出来的一条道路。

现代大学的精神元始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兴学强国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有着怎样的渊源?

王杰: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,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,又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,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成长史。中国的高等教育,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,不是像西方大学那样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,而是诞生于国家危亡时刻的需要。

■高教视点

高校领导“体验学生生活”应成常态

■沈林

同晚自习、同就餐、同实践活动、同就餐……前不久,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罗嗣海开展了“学生生活体验日”活动,24小时与学生生活在一起,近距离体验学生生活,受到了广泛好评。

据现有的公开报道显示,罗嗣海是江西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今年推出“双体验日”活动以来第一个“吃螃蟹的人”。此后,江西师范大学、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相继开展了这一活动。从这些学校官微、官博的留言反映来看,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大学生“追星般”的欢迎。

正所谓“物以稀为贵”。前些年,校领导就是高高在上的领导,在校园里见到校领导都不容易,更别提校领导与学生一同生活。这几年情况虽有改善,但依然不容乐观。单从大学生对“双体验日”活动的反映来看,于普通大学生而言,学校领导仍旧是一种“稀有物”,领导们仅仅活跃在学校官网的简介里和大型活动的主席台上,与学生的距离甚远,对学生思想、学习、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内在诉求不够了解。在這種情況下,學校關於學生的各種措施的出台,往往容易出現與學生真正訴求之間的偏差,甚至適得其反,不利於學生成長。

高校負有諸多職能,但目前最根本的任務依然

■域外传真

大学需为α世代做好计划

■雷切尔·霍尔

现在的大学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Z世代,即上世纪90年代中叶与之后出生的人,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了学生和潜在的求职者。这一代人伴随着科技长大,社交媒体和网络塑造着他们的教育和互动模式,现在大学已经在尝试迎合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协作精神的学习方式,但是,面对其之后尚未出生的一代——α世代,大学又该如何应对呢?

美国教育部前高级政策顾问卡伦·格罗斯认为,



图片来源:卫报网

为,大学需要多考虑几步。在她的《独立学习者》一书中,她强调大学不能只是被动地迎合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,而更应该了解即将到来的学生大军。

坦白来讲,至少美国教育是依托一种体系的方式呈现的。大学教授期望与他们相似的学生,具有像他们一样的行为和学习方式。但是,教职人员们需要意识到年轻人究竟是如何在学校学习的,特别是那些非常习惯于科技氛围的学生,比如α世代。事实上,今年夏天就有大学举办了幼儿编程营。

让我感到很麻烦的一点是,教职人员的发展拘泥于自己的原则之内,这就导致其不能横向跨越教育体系。所以,那些幼师应该与大学教师沟通,告诉他们尚小的孩子是如何学习编程、如何使用电脑程序和游戏的。

我认为,Z世代和α世代的不同将体现在两个方面:第一,α世代的科技在社会经济的渗透下,对孩子的影响将更加深刻;第二,至少在美国,α世代的孩子将面对更加多样化的世界。有数据显示,种族和信仰的多样化将遍及人群。因此,大学

学强国始终是其精神定义。

可以说,兴学强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四大模式之一,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。这种价值观,从中国近代大学一开始出现一直到现在的强国梦,都是一脉相承的。

其实,我国不只是高等教育在兴学强国,其他行业也都在追求着强国梦,因为我国民族存亡的危机直到现在都没有解除。这一点,只要看看严峻的国际形势就一目了然了。

作为现存唯一的一个四大文明古国,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下,我国高等教育更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的道路,最突出的就是兴学强国这面旗帜不能倒。

我国大学是有自己文化特色的,如果把我国高等教育比作一棵大树,那么,我们的知识构成就是以民族文化为根,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为魂,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蓬勃为冠,以兴学强国为生命力。只有这样,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。

教育模式的全新突破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在推动我国“双一流”建设的进程中,兴学强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?

王杰:现在通常所讲的世界一流,其实是以美国大学为标准,因为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,前十名主要是美国大学,前一百名也有近一半是美国大学。

改革开放近40年来,我国一直在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,很多大学提出了综合性、研究型、开放式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。

当然,美国教育先进,我们主动学习的态度是正确的。但学了这么多年,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。

如今,就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,我们学习美国教育模式也面临着一个临界点,要想实现突破,就得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。我认为,突破点就在于兴学强国的观念,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。

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,我们不是追求西方标准上的世界一流大学,而是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,而这个特色就是兴学强国,具体来说,包括植根于传统文化、文化创造力等。

如果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看未来的话,我国的大学肯定是在中国特色前提下的世界一流大学,不是美国大学的翻版,而是完全有中国特色、中国内涵的自己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新道路。

■教育观察

奖助学金发放应更透明

在笔者看来,奖助学金发放的透明度不够,持续性不强。

由此,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将“学生生活体验日”变成一项制度,使其成为一项常态化的活动,同时加强指导与督查,避免其成为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的“应付式”“应景式”“作秀式”活动。不仅要在广度(确保全省高校全覆盖、每一个高校和领导班子能够体验到)、温度(学校领导走进学生传递温暖和关爱)、深度(高校领导既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,又了解了服务学生的需求)上下功夫,还要主动在频度和效度上下功夫。通过“校领导接待日”“校领导喇叭派”等各种有效举措,增加领导们走近学生的频率和走进学生的紧迫感;通过出台措施,强化指导和督查,增强领导走到学生中间、解决学生问题、帮助学生成长的实效性。

窃以为,唯有“校领导走近、走进学生”不再成为“新闻”,即校领导“体验学生生活”成为一种新常态,领导与学生交流、交心、交友,掌握学生思想动态,熟知学生内在诉求,学生的各方面问题才能得到更为及时和妥善地解决。高校的育人工作才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。

(作者系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)

近期,有网友爆出,国内某些高校在“偷偷”资助校内的贫困学生。即学校根据学生在食堂用餐量,找到贫困学生,然后通知学生去领取生活补助。这种“隐性资助”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叫好和点赞。

在此,笔者也总结了公众对于这种方式的正面评价——过去,高校对贫困生的判定和资助的争议不断,导致资助有不公平现象发生,有些不太恰当的助学方法也的确产生了“救了贫,却冷了心”的负面效果。相比之下,这种“隐形资助”的方式要更加暖心,而且专门发放餐补的形式,也可以防止学生把助学金、奖学金用到其他方面。

近年来,这种被认为是“低调而温馨”的做法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中施行了。特别是有报道称,这样的资助方式要在全中国高校推行。如此说来,这就意味着高校教育管理者认为这种方法是好的,所以才会愿意坚持并推而广之。

然而在笔者看来,以这种“偷偷资助”的方式资助大学生,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明智之举。对于受益者和一般公众对此“善举”予以好评,笔者表示理解。但笔者不能理解的是,何以也会如此笨拙的方式也会在高校层面备受好评?

首先,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生规模都是数以万计的,那么,每天、每月都要紧盯学生在食堂的就餐情况,这是一种什么情景?或许其中的某些工作可以通过计算机完成,但某些电脑无法完成的工作,如统计、甄别以及发放等,依然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。而且问题的关键是,这样的工作实在没有必要。

其次,对于学生在食堂花费少的现象,当然值得研究,但除了个别案例外,家庭贫困生在食堂花费少的最终原因,还是学校给大学生发放的奖/助学金不足以应付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支出。更直白地说,就是钱发少了。不是生活拮据,谁会节衣缩食呢?

第三,这样一种补贴方式虽然在个人看来有些暖心,但往小处说,显得不够大气,往大处说,这绝非一所现代大学所为。

在世界范围内,现代高校对学生的资助方式无论怎样称呼,无非就两种,一种是奖学金性质,另一种是助学金性质。前者看表现,学生因在各方面的表现才能优异而获得资助;后者则根据家庭收入及其生活状况而获得应有的经济资助。

根据网络信息,在笔者所供职的中国人民大学,两种奖学金种类繁多,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——奖/助学金基本上能够抵消学费与生活费。这是网上所说,但笔者所以采信,是因为这是奖/助学金发放的目的所在。

在国外,美国高校的奖/助学金同样五花八门,但选取方式大体相似:第一是 merit-based,即只要优秀,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学金,与家庭收入等其他因素无关,这类奖学金的荣誉成分更多,但不一定丰厚。第二是 need-based,即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和在校期间的需要,发放相应的经济资助费用,一般家庭的大学生大都会申请这类奖/助学金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狮子大开口,这种申请方式与自己的录取有关。如果学生根据自身情况申请了2万美元,经审查符合实际情况或者符合学校的相应标准,学生便可以拿到录取通知书,但若申请了3万美元,就有可能被拒。第三,还有一些资金雄厚的私立院校,采用 need-blind 的方式,这实际上与第一种有关,即不考虑家庭背景等,录取后根据学生的需求发放奖/助学金。他们考虑的是学生家庭能够承担多少,其余的全部由学校负担。这当然是只有“牛校”才有资格这么做。

因此,在笔者看来,只要根据学生真实的家庭收入情况,加上考察所在高校当地的生活水平乃至全国高校的平均水平,便可以大体计算出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花费与支出。无论是奖学金还是助学金,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进行发放,而无须到后来才发现:居然还有大学生吃不饱饭!

也许有人会说:对高校而言,发放奖/助学金是有着一定的复杂性,某些学生虚报数据,或者拿救济款高消费等行为也不在少数。对此,笔者认为,管理者应该把人力、时间、精力放在前期确保学生上报的数据真实性上,放到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而不至有人钻空子上。在现代社会,问题的出现都与制度设计有关。制度设计得好,奖惩措施得当,上述情况就会减少,甚至消失。

如果大学生需要资助,请公开透明地资助他们。让他们在大学期间衣食无忧,让他们感受到学校、政府与国家的支持、温暖与爱。没有必要让我们的莘莘学子、祖国的未来为每个月360元的伙食费而对学校感激涕零。这是学校应该做的。甚至可以说,它是前期工作没有做好,或者不同部门之间协调不够,而不得不在后期采用的补救措施。

总之,在现代文明社会,一所文明的大学,应该使用文明的思维方式、文明的制度措施与文明的经手手段来管理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)

资助大学生是否该「偷偷」进行

■郭英剑